

学人坊

文化立场与 艺术表达

浙江新时期小说创作研究

ZHEJIANG XINSHIQI XIAOSHUO CHUANGZUO YANJIU

WENHUALICHANG
YU
YISHU BIAODA

刘树元 王昌忠 著

沈阳出版社

浙江新时期小说创作研究

学人坊

文化立场与 艺术表达

浙江新时期小说创作研究

ZHEJIANG XINSHIQI XIAOSHUO CHUANGZUO YANJIU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WENHUALICHANG

YU

YISHU BIAODA

刘树元 王昌忠 著

责任编辑：王昌忠

封面设计：王昌忠

校对：王昌忠

版式设计：王昌忠

书号：ISBN 978-7-241-3230-0

定价：60.00元（全三册）

联系电话：024-85264928

邮购热线：024-85264922

E-mail: sylvia_xia@163.com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立场与艺术表达：浙江新时期小说创作研究 / 刘树元，
王昌忠著.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7.12
(学人坊)

ISBN 978-7-5441-3530-6

I. 文… II. ①刘…②王… III. 小说 - 文学研究 - 浙江省 -
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197346 号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印刷者：沈阳师大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47mm×210mm

印 张：25

字 数：550千字

出版时间：2008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萧大勇

封面设计：书之

责任校对：晓 慧

责任监印：杨 旭

书 号：ISBN 978-7-5441-3530-6

定 价：60.00元 (全三册)

联系电话：024-62564958

邮购热线：024-62564935

E-mail: sysfax_cn@sina.com

沈阳出版社

141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1

142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2

144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4

145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5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第三章

146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6

147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7

148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8

149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49

150 \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 150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第四章

第一章 吴越文化对浙江文学的影响

叶文玲：一曲女性生存宿命的悲歌 / 3

李杭育：寻根小说的文化立场 / 19

余华：暴力与苦难彰显下的人文叙述 / 39

余华：民间情结的艺术化呈现 / 51

陈源斌：底层法制关注与积极的艺术叙事 / 71

王旭烽：文化与历史观照下的人文叙述 / 84

夏季风：建构小说的诗性特质 / 100

张廷竹：怀疑精神与改造热情结合的写作 / 111

陈军：审美的历史与文化的审美 / 128

第二章 吴越文化交织的浙北作家

张界愚:时间的本质与小说时间的艺术表现 / 141

闻波:深涧远山的人性坦陈 / 155

潘无依: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真实 / 164

刘平:现实主义写作的永恒魅力 / 192

第三章 在文化感伤中挺进的浙东、浙西作家

艾伟:以诗学理想和快感资源状写人的丰富性 / 209

王彪:《复眼》的“复眼”叙事 / 233

赵柏田:在现代生活与历史话语之间穿行 / 243

杨静龙:当下底层社会生活的吴越文化贯穿 / 254

阙迪伟:对农村现实生活的高贵书写 / 264

第四章 经济与文化互动的浙南作家

钟求是:现代生存焦虑与尴尬艺术视像的悲怆喜剧 / 279

王手:面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达 / 293

吴玄:欲望化的当下叙述和生活的理性思考 / 303

后 记 / 313

第一章

吴越文化浸染的杭城作家

叶文玲：一曲女性生存宿命的悲歌

《三生爱》是著名作家叶文玲在2006年8月出版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将近40万字的长篇巨制里，叶文玲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而又坚决强劲的目光检索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幅度内，扫描在包括中国、日本、欧美等在内的世界版图上，从而为我们“搜刮”并显影出姥姥娒娒、母亲娒娒和女儿茫茫一家三代女性的鲜活形象。尽管作品中的三位女性跌宕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沉浮在相异的时代环境下，但她们的生存处境、命运遭际都没有摆脱悲剧的作用和钳制。叶文玲在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社会变迁中无比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凝视、倾听了这一家三代引领、承受作为女性无法拒绝的宿命般的悲剧命运的生命过程和心灵劫难。因而可以说，《三生爱》是作家通过一家三代女性悲剧命运的“记录”为我们谱写的一曲女性生存宿命的悲歌；作品如泣如诉、如歌如怨、一咏三叹，呈现出浓烈的悲剧美学特征。

一、女性悲剧命运的表现

由《三生爱》可以看出，作家叶文玲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的命运投注了大量关注、思考，并寄与了无限的同情和爱

怜，因而对女性悲剧命运有着深刻的洞见和深切的感受。作品对女性悲剧命运的表现是全方位、多侧面的，不仅打点、涉及了女性外在的情爱悲剧、现实生存悲剧，而且直抵女性内里生命，揭示、展现出她们悲剧性的心灵事实。

1. 悲剧性情爱际遇

爱情，在女性的生命天空里一直占据着至高的位置，梦想爱情、寻觅爱情、经营爱情、呵护爱情，几乎就成了众多女性生命的主题，而是否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往往就成为甄别女性人生是悲剧性的还是喜剧性的明显标志。爱情是男女双方“混生”而成的，因而，对于爱情的一半——男性，也就是爱的对象，女性总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三生爱》中那个船与桅杆的比喻可谓把女性对情爱的诉求、对所爱所托男性的珍重具象生动地道出来了：“女人在这个世界上顶多也就像一条船，男人……对了，男人就是船上的桅杆！没有桅杆，女人的这艘船就无法开航……永远只能孤独地停泊。”“当然，不只是肉体，而且也是精神之桅！”然而，美满的情爱并不因为女性的强烈渴求和竭力料理而总能如愿以偿、顺心如意地降临并止泊成女性生命王国的永恒；实际上，求而不得、梦而不圆、守而不驻，古今中外，多少女性没能绕开这种悲剧性情爱际遇啊！《三生爱》里的姥姥娒娒、母亲娒娒和女儿茫茫一家三代女性竟然都无一幸免地被悲剧性情爱作用上了，从而演绎了三出形式不同而实质共通的女性情爱悲剧。娒娒与“绿壳”（土匪）于是宗的爱情可谓惊世骇俗、感天动地：竟然“在祠堂的那张供奉祖宗的供桌上做”爱；当娒娒作为“鱼精”供奉在龙王庙求雨的供桌上时，“绿壳”竟将她“劫”走，以至于两人到日本开起了夫妻“渔民”小店；在日本时，“娒娒”这一芳名，于是宗竟然只能容许他独自享用，如别人叫了他就要大动干戈……可是，娒娒却无法守护和尽情品味这美妙绝伦的爱情，因为于是宗在替催逼房租的房东打赌——

“在脑袋不冒出水面的情况下泅渡那条若狭河”——淹死在浓烟和恶浪之中了！开放、漂亮、率真、热情的婧婧对爱情的向往和体验同任何女性一样痴迷、热烈：少女时对滨声春意萌动的初恋情怀，在春情荡漾中让“那个‘身影’用两臂环着她的腰”享用爱情的迷醉，即便在“寒风凄凄”的“文革”灾难岁月，也希望“以身相许”廖若晨而获得平实的爱情……但滨声“大潮巴”一个，“一点也不知道”；与她相好的那个“身影”“在先前的两派武斗中被对方打死了”；与廖若晨的盟约还没有实现，却在不堪忍受的蹂躏中愤然而逝了……由此可见，爱情对婧婧吝啬到了不尽天理的份上，只能使她一再浸身在悲剧性情爱际遇中。至于宣称“如果找到了真爱，拥有了真正的爱情，我会用生命的全部汁液为之浇灌”，“我可以为我的真爱殉情，为我心爱的人去死”的茫茫，自然一直都在构思、设计当然也一直在打造、上演死去活来、荡气回肠的爱情，如对老 G 的如火如荼、对 W 的美妙构想、对蓝总等的“一见钟情”，特别是对周立铭心刻骨、魂牵梦系的心灵之爱、精神之爱，不幸的是，这些爱情不是骗局诡计就是过眼云烟，或者为无果之花，只能让茫茫用悲剧来为这些情爱际遇收场，并留给她噬心的伤痛。

2. 悲剧性生存处境

除了情感生活饱受悲苦、磨难的击打和煎熬，《三生爱》中的一家三代女性姥姥婧婧、母亲婧婧和女儿茫茫在现实生存中，也没能游离出不幸和苦难的纠缠与掌控。虽然所处社会时事环境各个不同，生命经历和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虽然她们都热爱生活，并以超凡脱俗的女性容貌和性情关爱着世界、美丽着世界，但是现实世界并不回报她们以宠爱和照顾，而是把她们都无一例外地“邀约”进悲剧性处境中：她们的生命都在伤痕累累、千疮百孔后戛然而止。在小说中，叶文玲简直是将外婆婧婧当做苦难的化身“锻铸”的。仅仅由于“独特的美丽”和“粉嫩白

净”，被邻人认为不正经以至于“告知”自家小孩“不要同这个叫做娒娒的女孩儿来往”，从而受到冷落和歧视；当与“绿壳”于是宗的情爱被发现后，被处以族规直至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而且落下“不要脸”和“小婊子”的声誉；而在“祈神行雨”的仪式中，她更是被当做“鱼精”不仅被赤身裸体装在渔网里满足人们“火辣辣”的眼睛，而且还被供奉在龙王庙的供桌上……如果说上述这些是娒娒年少时的悲剧性生存处境，那么到了成年、晚年也照旧领受着悲剧没完没了的摆布：在日本爱夫于是宗猝然而逝；就在为了逃回中国，刚刚“接受了班的柔情”时，班“却突然消失了”；成为井上诚一的“续弦太太”总算得以回国，可井上诚一却“突然病死”；解放后背着“不正派”的名分遭受人家的“瞧不起”和排斥；“文革”中更是被当做“大汉奸大破鞋”挨尽了批斗和打骂，最后终在女儿“顶着这项‘坏头头’的罪名被发配到内蒙劳改之时”悬梁自尽抖落了悲凉、痛楚的一生。母亲娒娒短暂的一生，也只有用“悲剧”二字才能统摄、涵盖得住。没有父亲，甚至不知道父亲是谁的身世，“馈赠”给她少年时代的是冷嘲热讽、流言蜚语；“文革”动乱把她“动”到了内蒙成为“人人可欺的‘女三劳’”；捆在马身上被人野兽般地轮奸、践踏并怀上身孕，终于忍无可忍地与强奸者同归于尽。至于女儿茫茫，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社会，把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置于悲剧性处境的可能性都远为减少，而且给人提供的捭拂生存悲剧因子的机会大大增多；也虽然自勉“时代不会让你再蹈母亲和外婆的覆辙，你一定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茫茫自身比娒娒、母亲觉醒也刚强多了，但是，生存的悲剧终归还是没有放弃“捕捞”她。因 W 从中作梗被电视台找借口解聘，“周游世界”时被梅妮视为同性恋对象，甚至被老菲力普要求作“陪伴”者，在国外开服装店“被‘自己人’坑”从而“遭受了失败”……诸如

此类的挫折和不幸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她，而最后，她的年轻的生命竟然被美国那场震惊世界的“9·11”给没收了。

3. 悲剧性心灵事实

深刻、巨大的悲剧都发生在人物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这就是古语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当代悲剧对人的自我认识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表现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刻画人的深层意识与精神生活的两难处境。”^①的确，置身纷纭错乱的现实世界，人的精神心灵总是处于两种或多种选择的冲突之中，而且“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之中”。^②一方面，这种二律背反的冲突把人的灵魂置于撕扯、挣扎的痛苦情景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人只选择了一方的事实，或者丧失了选取另一方的应有所得，或者选取的有可能恰恰是会带来较大损失和不幸的一方。这两方面无疑都使人的精神心灵蒙上了厚重的悲剧性色调。既然“悲剧张力的当代性不仅表现为悲剧冲突深入人内心”，而且表现为作品中设置的“二律背反——悲剧冲突悖论”^③，那么，作为一部悲剧作品，《三生爱》的悲剧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这种“当代性”的。在《三生爱》中，透过女儿茫茫的心灵事实，可以看出上述“当代性”悲剧的大致表征。对于茫茫来说，一方面，她为自己确立了“在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中，我一定要与众不同”，“以自己的扬眉吐气来为我母亲、为我外婆报仇雪恨”的“生活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美丽

① 朱栋霖：《戏剧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② 黑格尔：《美学》卷三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8页。

③ 朱栋霖：《心灵的诗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朝气、情感丰富、才华横溢的青春女性，她又渴望“一个人应该有的常情的幸福”和“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在她的心灵原野上，显然这两股力量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她没有让两者一直较量、争斗下去，而是扼住了后者的缰绳而扬鞭催动了前者：“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险恶世情布下的一连串荆棘中穿越，一直在努力攀越那一座座树着生活目标的崇山峻岭。”如是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人生应有的“庸凡如常的幸福”与“亲情与慰藉”“都没有了”自不必说，而且因为“精神沉重超过了本该有的负荷能力”而感到了疲惫和精神质量的“倒退”；更不幸的是，就算因为选择后者而“有过幸遇有过成功”，这一切带来的也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是过眼云烟”，并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凡此种种可以看出，茫茫在二律背反中的选择酿就了她心灵宿命般的悲剧事实，茫茫的精神心灵在这种悲剧中感受到的是叔本华所谓“最大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最大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这样我们就会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已到地狱中来了。”^①

二、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鲁迅先生对悲剧所作的精辟而到位的判语。正因为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所以悲剧在人的精神心灵里产生的是哀怜、悲痛、恐惧的审美感受，所谓“悲剧是悲痛的艺术”，“悲剧所产生的快感只是哀怜与恐惧两种净化后的那种特殊的快感。这种特殊的快感来自痛感，是愉悦美感之中的痛楚之感，给人以心灵的痛苦与随

①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3页。

之而来的美的愉悦”^①，所说的即是悲剧的这种美学效应。那么，“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何以会“毁灭”呢？事实上，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存在的还有与之异质、对立、矛盾的“东西”存在——当然，按照当代悲剧观，它们未必就不合理、就没有“价值”，悲剧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两者总在冲突、较量，而且冲突、较量的结果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了“毁灭”！读罢长篇小说《三生爱》，我们无不为作品中一家三代女性的不幸命运掬一把同情、悲悯的泪水，因而在美学形态上，作品当然可以看作一部典型的悲剧。作家叶文玲在作品中不仅记录和显影了娒娒、婧婧、茫茫以及梅妮这些女性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生命）的“毁灭”，而且将犀利、敏锐的笔触投放到广袤的社会时事原野，深入幽远的文化肌体，探索人性的隐秘空间，攫取并捕捉到与娒娒们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相抵牾的并在两相冲突中“毁灭”掉“有价值的东西”，以至将她们沦入悲剧泥淖的“东西”。也就是说，叶文玲创作悲剧性长篇小说《三生爱》的内在动因，根本的不在展览娒娒们的悲剧命运，而在发现和揭露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通过小说作品可以看出，叶文玲是着力从文化、时事、人性诸方面考察和探析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的，并因此以鲜明的情感态度和思想立场做出了有效的文化批判、时事批判和人性批判。

1. 社会文化

社会政治制度、法律规章、伦理道德、规矩讲究、习俗风尚、时代气候等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构成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人能作为人而存在的基本保障和物质环境，但另一方面，也对作为个我的人的存在带来规约和限制，有时甚至带

① 朱栋霖：《心灵的诗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来严酷的伤害和致命的戕击，从而把人置入悲剧性命运处境。对于《三生爱》中的娒娒、婧婧、茫茫们来说，社会文化无疑是促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年少的娒娒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愚昧、迷信、残暴、专横等负面因素猎获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三从四德的封建文化使得她因“独特的美丽”而被看成不正经，并遭到冷落和白眼；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文化使得她和于是宗的爱情于世不容，残暴专横的封建家族文化不仅活生生地剥夺着她爱的权力和自由，而且血淋淋地用族规摧残、掐灭着她的肉体和精神生命；至于在“祈神行雨”被当做“鱼精”使得身体和心灵都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戏弄，当然是封建迷信、愚昧作祟的结果。可以说，在社会文化层面，娒娒的悲剧，是集合了几乎所有负面因子的封建文化在一个柔弱似水的女性生命世界里极尽施暴之能事的必然结果！婧婧呢，同样没有游离出社会文化负面因子的“盯梢”和“追逐”，因为美丽，因为向往自由和爱情，当然也因为“不正派”的母亲，从小饱尝的是“半掩门家”之类的冷嘲热讽和“老的陪着小的去做‘人流’了……”之类的流言蜚语。茫茫生活的是一个至少在表面上封建文化已经解体的新时代，因而她所遭遇的封建文化的伤害自然就少多了——但并非丁点儿都没有，比如她被电视台解聘，无不与电视台领导封建官本位思想有关（他们听从的是作为领导的 W 的“命令”）。然而，新的时代、新的世界的文化，却“收集”起其负面因子向茫茫发起了进攻。1990 年代的中国，金钱在包括文化生活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唱起了主角。正是这种金钱文化伤及了茫茫：老家南浔的堂叔堂兄们一直虎视眈眈并挖空心思算计着祖上留给她父亲的房子，乘父亲过世茫茫处于痛苦之中他们就几乎在料理父亲丧事的同时占取了那房子。除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伤害，“闯荡世界”的茫茫还受到了异域文化的伤害。同性恋已经成为西方一种带有“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文化，但它与中国文化却

格格不入，所以当梅妮试图把这种异域文化强加给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茫茫时，她显然受到了伤害，而为了摆脱这种伤害又不得不承受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困境。

2. 时事政治

每个人都存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时事、政治运动往往就成为最能左右、主宰人的命运的强大、势不可挡的力量。如果要概说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时事，用战争、动乱、动荡作关键词恐怕是不为过的。可想而知，这样的政治时事自然最适合成为滋生悲剧人生的“温床”。的确，打开近一百年的社会生活史，我们能听到多少凡俗人生在灾难的琴弦上奏出关于各自悲剧命运的悲吟苦咏。《三生爱》中的娒娒、婧婧、茫茫一家三代女性所寄身的正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时段，因而她们的悲剧人生无疑与此时段政治时事的“造化”密不可分。我们先来看战争和政治运动是如何“作用”在娒娒身上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给娒娒造成了无比巨大的厄运和无比深重的痛苦：在于是宗打赌丧命后为了能回到中国，她险些作了“战地服务员”（慰安妇）；好不容易以井上诚一的续弦太太的身份回国并定居到了山东，但日本战败投降后井上诚一却不得不撇下她回日本并“在回国途中突然病死”；她落下“汉奸”的罪名因而一生无法抬头。“文化大革命”这场惨绝人寰的政治动乱，更是把娒娒抛向了命运的绝境：首先是她被当做“隐藏在革命群众中的反动分子”和“大汉奸大破鞋”而受尽了批斗和蹂躏，接着是女儿婧婧在捉摸不定的政治斗争中被当做“坏头头”发配到内蒙时她悬梁自尽！婧婧当然也是社会时事、政治运动的直接牺牲品。首先，因为那场侵华战争，她被“赐予”了“外国种”的身世起源，与“大汉奸”母亲承受着凌辱和批斗。其次，“文革”的政治武斗夺去了与她相爱的男人的性命，并因受男友的牵连而“被判了七年劳改”发配到内蒙。最后，在内蒙时因为“反动派”和“坏头头”的政

治身份而遭受着不堪忍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直至自焚而终。至于茫茫，固然政治运动没有直接殃及到她，但间接的伤害还是有的，比如被廖若晨带回故乡南浔时被人叫作“野种”、“小反革命”，而且被“那些个男孩”揪着小辫子从“他们的胯下拖过去”自然是政治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就算茫茫没有遭到政治运动的直接袭击，但新世纪的最大社会时事——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行径——却正面命中了茫茫，而且命中得那么彻底、那么纯粹，直接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其悲剧性自是不言而喻的。

3. 负面人性

只单独强调“人性善”或“人性恶”，其实都是片面和极端的，因为人性总是由善、恶两面交织而成的。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人与外物（主要是人）打交道、在人应对和处理它们时体现出来的。当体现的是善时，给应对、处理对象带来的则可能是美好、幸运；而当体现的是恶时，则有可能是厄运、破坏降临到应对和处理对象上。《三生爱》中娒娒、婧婧、茫茫一家三代女性的悲剧性人生处境、命运遭际，除了“获患”于前面分析的社会文化、时事政治，也是与她们打交道时应对、处理她们的某些人的负面人性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娒娒还是婧婧、茫茫，作为美丽非凡的女性，她们遭遇最多，也因而受难最多的是来自男男人性中的色性和淫欲的侵扰与触犯。从心理学和生理学上讲，人性中的色与欲未必就是负面人性，但是，如果这种色和欲突破了人之为人的规约和界限并给施色和泄欲对象造成了痛苦和不幸，则是负面的了。娒娒打小就受着男人们的色性和淫欲的侵犯和威胁，男人们“我用不了三下就教她压成一块香喷喷的豆腐干”之类的“轻薄话”如果说只是带来心灵伤害的话，那么一丝不挂地被男人们抬着供他们参观“白花花”的身子就是肉体受难了。在日本，当于是宗去世后，“那越来越多的不怀好意的男人的眼睛”使娒娒又不得不承受没完没了的性侵犯，以至于“无